

清代學術思想史引言

林 尹

一、清代學術思想變遷之原因

吾國學術思想，自秦漢以降，日就衰落；至於清代，忽放光芒。學者既以實事求是為鵠的，且又饒有科學之精神；一掃已往空談講學之弊，啓二千年來所未發之旨，而與後人以無窮之智識。故梁啟超謂：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，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，倒捲而編演之；如剝春筍，愈剝而愈近裏；如啖甘蔗，愈啖而愈有味；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。然所以有此奇異現象者；推厥原因，蓋有三端；一則對於宋明理學之反動，二則受政治勢力之影響，三則歐西文化之輸入也。

對於宋明理學反動，故以實事求是為鵠的，而以復古為職志。蓋宋儒雜佛老孔孟之說，而倡理學。或逞臆說以誣聖，或憑空言而自矜；流風所被，天下群從。迄於明代，其流益下；講學之風日盛，而虛疏之病愈甚。束書不觀，空言性命之旨；游談無根，相爭口舌之間；各自以為得玄珠於赤水，繼跡於尼山。桎梏天下之人心，使棄國家民族於弗顧；蹈魏晉清談之轍，而資天下於夷狄。彼高談性命之道者，且或視顏事仇，恬然自安。此一二有志之士，所以發憤慷慨，思有以矯其弊，而振民族人心於既亡也。故顧炎武曰：

『劉石亂華，本於清談之流禍，人人知之。孰知今日之清談，有甚於前代者。昔之清談談老莊，今之清談談孔孟。未得其精，而已遺其粗；未究其本，而先辭其末。不習六藝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。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，而曰一貫、曰無言。以明心見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實學。股肱惰而萬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國亂。神州蕩覆，宗社丘墟。昔王衍妙善玄言，自比子貢。及為石勒所殺，將死，顧而言曰：『吾曹雖不如古人，向若不祖尚浮虛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猶可不至今日。』』今之君子，得不有愧乎其言。』（日知錄卷七）

炎武此言，蓋以明社之亡，實由於清談之流禍。然推原禍始，則提倡斯學者，亦不能辭其過也。故其責王陽明曰：

『以一人而易天下。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，古有之矣；王夷甫之清談，王介甫之新說。其在於今，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。孟子曰：『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。』撥亂世反諸正，豈不在後賢乎？』（日知錄卷十八）

王夫之亦謂：

『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，其究也，刑戮之民，閹賊之黨皆附焉，而以充其「無善無惡，圓融事理」之狂妄。』（正義注序論）

至於李恕谷朱舜水等，則尤爲憤慨。李恕谷論當時理學之弊曰：

「……高者談性天，撰語錄，卑者疲精死神於學業。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，即當世之刑名錢穀，亦憊然罔識，而溺管呻吟，自矜有學。……中國唱筆吮毫之一日，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。卒之盜賊竄起，大命遂傾，而天乃以『帝三王相傳之天下，授之塞外。』（恕谷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）」

又曰：

「宋後二氏學興，儒者浸淫其說。靜坐內視，論性談天，與夫子之言，一一乖反。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，則拱手張目，授其柄於武人俗士。當明季世，廟無一可倚之臣，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，敵兵臨城，賦詩進講，覺建功立名，俱屬瑣屑，日夜喘息著書，曰，此傳世業也。卒至天下魚爛河決，生民塗炭，嗚呼，誰生厲階哉？」（恕谷集與方靈皋書）

而朱舜水亦曰：

「明朝以時文取士，此物既爲塵羹土飯，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。……於是分門標榜，遂成水火，而國家被其禍。」（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）

蓋明以八股取士，當時士子，舍永樂欽定性理大全外，幾一書不讀。求高官爲目的，惟利祿是視，習染成風，故有明一代，幾無學術之可言。彼不學之徒，爲奸爲盜爲賊，姑無論矣。王陽明以傑出之才，倡致良知之說，謂可以振頹風於末俗，與當時以棒喝矣。然承其學者仍多迂闊不切時務，空疏而無學問，及其末流，終於潰敗；積往不返，乃至亡國。此清初諸大師之最痛心疾首，所以發憤慷慨，痛加貶斥；思矯其弊，而振民族人心於既亡也。故顧炎武倡『舍經學無理學』之說，教學者脫宋儒明儒空談之羈勒，直接反求之於古經。閻若璩辨古文書爲僞作，起求真之觀志；胡渭攻河圖洛書爲後託，掃空說之根據；考證學之規模以立。顏元李塉倡『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，亦不當求諸書冊，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』之說。盡闢不切時務之談，而歸諸實事求是之鵠的。黃宗羲雖受業於劉宗周，亦悲清談之亡天下，故修正其師說，以史學爲根據，而推之以當世之務。至於王錫闡、梅文鼎等，則專治天算，開自然科學之端緒，此皆與明儒清談之學絕異。故當時猶以性理之學爲依歸者，如張履祥陸桴亭等，亦知空談之足以誤天下人心。張履祥言『學者舍稼穡外別無治生之道』，而居鄉躬耕，習於農事。陸桴亭言『陽明少時，實嘗從事於禪宗，而正學工夫尙寡』，期復歸於程朱格物之旨；然其學終不能張，亦可見當時人心對於宋明理學反動之劇也。

受政治勢力之影響，言多忌諱；故考証之學，益盛極一時。蓋清以夷狄，入主中華；人心未死，必有抗者。清兵下江南，顧炎武糾合同志，起義兵守吳江；事既敗，復北遊而觀形勢；陰結豪傑，以圖光復。五謁孝陵，（明太祖陵，在南

京。六謁思陵。(明懷宗陵，在河北昌平。)其故國之情，終眷眷而不忘。黃宗羲乞師日本未成，歸而起義兵守浙江；事敗隨魯王於舟山，猶與張蒼水煌言馮麟仲京第等力圖匡復，潛行內地，有所布置；於是江浙一帶，不斷反抗。故滿洲之奠定北京，雖僅四十日，而平定各地，幾及四十年。以四十年之經驗，知降將悍卒，可以武力制服；而一二學者，秉不屈之精神，為民衆之指導，反足以為統治之障礙。故天下既定，遂以全力應付讀書之士；而其策略，亦一再變更。初自順治元年至十年之間，倉猝入關，規模未備；非有文化漢奸，則朝綱不能立，民情風俗不能明悉；故以利用政策，籠絡下流之士，無恥之徒。當時如陳名夏、陳之遴、錢謙益、洪承疇、龔鼎孳等貳臣，亦見利忘義，不惜賣其祖宗父母之國家於夷狄，為虎作倀，以摧殘吾黃帝子孫。於是開科取士，沿襲明代八股，以為愚民之工具。而熱中功名富貴之人，亦遂忘其亡國之痛，甘心為奴為婢，屈膝於胡虜之前。此有志之士，如顧黃諸大師，所以呼天搶地，力闢不切時務之談，實事求是；倡廉恥，振人心，而一再奮抗於南天也。清室亦知利用政策，不足以網羅高尚之士，故自順治十年以後，以迄康熙雍正乾隆之朝，天下大定，遂一變而為高壓政策。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，糾眾盟會；一言不慎，輒罹殺身之禍。科場案件，幾連年有之，姑不具論。江浙人文淵藪，反滿之精神，最為激烈；故自「甌江之役」(即順治十六年，鄭成功、張煌言北伐之役，)以後，借「江南奏銷案」為名，被牽累者一萬三千餘人，縉紳之家，無一倖免。又以江蘇秀才倪用賓等十八人，聚哭文廟，指為聚眾倡亂，搖動人心，不分首從，皆處極刑。滿人之防漢日嚴，漢人之言論思想，均失自由；而莊廷鑑之明史獄，戴名世之文集獄，查嗣廷之試題獄，陸生椿之論史獄，謝濟世之經注獄，曾靜、呂留良之文評獄，胡中藻之詩鈔獄，王錫侯之字書獄，相繼而起。此外比附妖言，告訐詩文之事，紛然亦興。如陳鵬年作游虎邱詩，幾至不免；蔡顯錄紫牡丹詩，父子駢戮；凡若此類，不勝枚舉。當時學者，處於異族淫威之下，國家光復之望既絕；而動輒得咎，或至於戮及父母兄弟妻子朋友。故不得不移其精神，專致力於經史考證之學。蓋空談義理，既目為鄙陋，而經世致用，又勢不可能也。清主亦乘此機，兼施其懷柔政策，以收天下之人心。先是康熙十二年之薦舉山林隱逸，十七年之薦舉博學鴻儒；雖當時負重望諸大師，抱其不屈精神於終始，然十八年開明史館，學者眷戀舊國文獻，不忍使其湮淪，遂忍哀定痛，有出與夷狄相合力者，此清代懷柔政策成功之先河也。康熙中年以後，遺老大師，凋謝略盡，後起之秀，大抵生長新朝；亡國之恨，既已漸滅，而言論思想，禁錮益亟。然潛心學術，不觸忌諱者；朝廷亦褒之勸之，使安其所業。且多取詞藻華瞻，義理謹飭，考據淵博之文，以為標榜，而敦實學。初，康熙之世，以宋儒理學，足以束縛人心，與其宗旨相合；嘗極力表彰，隱示人以趨向。然理學受清初諸大師排斥之後，一蹶不能復振；強努之末，不可以穿魯縞，雖有政府之倡導，而民間「反宋學」之氣勢，仍未稍殺，(江浙一帶尤盛。)且有標漢學之名，與之抵抗者；至於乾隆，乃一變而偏重考證之學。乾隆元年，開第

(104)

家傳學鴻詞科，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，以紀昀爲總纂官，羅維天下才智之士，衣之食之，使盡其心力於文字典籍之中，（開四庫全書館，乃朱筠所奏請；當時治宋學者，如劉統勳等，曾極力反對，終於失敗。四庫全書，始編於乾隆三十八年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，凡歷十載。所採著錄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，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卷；存目書六千七百六十六部，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。因編書所搜集書籍，認爲有亂惑諱，而列爲禁書者，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，計焚燬二十四次，共焚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。故乾隆之間四庫館，有功於中國文化固甚大，然其罪惡，亦較秦始皇爲甚。）四庫全書既成，繕寫七本，頒貯各地：一，北京禁城之文淵閣本；二，北京西郊圓明園之文源閣本；三，奉天之文溯閣本；四，熱河之文津閣本；五，揚州之文匯閣本；六，鎮江之文宗閣本；七，杭州之文瀾閣本。於是漢學之風氣，盛極一時，而治學之方法，亦漸精密。自茲以降，達官貴人，富商巨賈，亦莫不崇尚漢學，附庸風雅，以自名高。書籍因而流傳，學者得以瞻養。故後之言漢學者，皆推乾嘉之時爲極盛，而以乾嘉諸老爲主臬；此蓋清代懷柔政策之成功也。章太炎先生曰：

「清世理學之言，竭而無餘華；多忌，故敢詩文史枯；愚民，故經世先王之志衰；家有智慧，大姿於說經，亦以紆死，而其術近工眇踴善矣。」（章氏叢書檢論清儒篇。）

嗚呼！清初諸大師，倡經世實用之說，期大有爲於天下，及其究也，乃至於抱殘守缺，屹屹窮年於無咎無譽之地，期苟全其首領。亡國之限，乃至於此，豈不痛哉！雖然，不能求實用於當時，轉而徵實證於古籍。此亦乾嘉諸老之所不得已也。自「鴉片戰爭」以後，繼以洪楊之亂；清廷高壓手段，漸不如已往之烈，而政治衰敗，亦日甚一日；有志之士，遂思有以自拔於桎梏之中，故經世致用之觀念，乃復活於人心。於是莊存與、劉逢祿等「今文學」派之言，亦與時俱興。龔自珍、康有爲等，更發揚其說，以治經學識切時政。然清初諸大師諄諄議論，夷夏之別，種族之觀念，至是遂蕩然無存矣。

歐西文化之輸入，故天算之學興，而治學方法，亦因而改良。先是明萬歷末年，以迄天啓崇禎之間；歐洲教士利瑪竇

（意大利人，明萬歷十一年東來，三十八年卒於北京。）龐迪義（西球牙人，明萬歷二十七年東來，四十六年卒於澳門。）熊三拔（意大利人，明萬歷三十四年東來，明泰昌元年卒於澳門。）鄧玉函（日耳曼人，明天啓元年東來，明崇禎三年卒於北京。）龍華民（意大利人，明萬歷二十五年東來，清順治十一年卒於北京。）湯若望（明天啓二年東來，清康熙元年卒於北京。）等，先後入中國；中國學者，如徐光啓、李之藻等，與相往來，對於各種學術皆加以深切之研究。徐光啓、李之藻、利瑪竇、熊三拔、龐迪義、龍華民、湯若望等，既釐正「大統歷」，完成歷法改革之業。而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，及利瑪竇所著之同文算指通篇，西國記法，句股義，圓容較義，辯學遺蹟，經天該，測量法義，渾蓋通憲圖說，萬國輿圖等；龐迪義所

著之人類原始、辯揭等；熊三拔所著之泰西水法，表度說，簡平儀等；鄧玉函所著之遠西奇器圖說錄，人身概說，諸器圖說，黃赤距度表，正球升度表大測，測天約說等；龍華民所著之地震解，急救事宜等；湯若望所著之學曆小辨，恒星出沒，交食歷指，西洋測日歷，古今交日考，交食表，恒星曆測，八線表，測食略，測天略說，新歷曉惑，大測，歷法西傳等；皆影響我國學術思想甚大；而徐光啓之農政全書六十卷，尤為我國農學界空前之著作，中西文化之溝通，及後世天算科學之發達，此實為其權輿也。至於清代，康熙以聰穎之資，向慕文化，且熱心實用科學，於天文曆算之學，亦嘗涉其藩籬。故用當時歐西教士南懷仁（比利時人，清順治十六年東來，四十七年卒於北京。）等，輪值上書房，進講測量數理等學；且藉此數人之助，製定康熙永年曆，並著數理精蘊，曆象考成等書，及造成觀象臺；於是研求西學之風氣，廣被一時。然明徐光啓等，初修新歷法之時，聚訟盈庭，卒以西法較密，而徐光啓等之說行。自此之後，學者遂有潛心測算，以期發揚光大我國舊文化；如王錫蘭之精思推步之理，於中西兩家異說，皆能條其原委，考其得失。梅文鼎遇「天算學」書之難讀者，必求其說，至廢寢食；考正古代曆法，（如著元史天經補注，古今天法通考，春秋以來冬至考等。）發明新法算書，（如著火緯本法圖說，交食算見等。）而期天算之學，簡而易明。（康熙二十八年，梅文鼎至京師，大學士李光地，請其作簡要之書，俾使人人得其門戶，因作天學疑問三卷，以曉初學。）於是梅文鼎、梅以燕、劉湘煙方中通等，相繼而起；而史學大師黃宗羲，考證學大師江永、戴震、孔廣森、焦循等，亦皆善於此道，黃宗羲啓閩若璩胡渭辨偽之風，江永戴震創經學院派；考證之學，因而大盛。且皖派考證方法之善，尤為他家所不及，條理清晰，而發明特多，此與歐西文化輸入，亦不無影響也。

二、清代學者治學之方針與精神

清代學術思想變遷之原因，既如上述；而學者治學之道，亦有異乎前代。志存致用，故「徵實」之風盛；辨偽求真，故「勤勉」之習成；力矯無學之弊，而求正確之解；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光芒，亦遂由此而放。故清代學者治學之方針，則在「徵實」；而其精神，則為「勤勉」。

「徵實」之方針，清代學者，類皆有之。清初諸大師，發憤慷慨，期光復我中國；乾嘉諸老，隱晦埋光，自保卒其餘年。故或徵於今，求實用於當時，或徵於古，求實證於典籍，此為不同耳。如江藩漢學師承記，記顧炎武治學之精神曰：「炎武留心經世之術，游歷所至，以二馬二驢，載書自隨，至西北阨塞，東南海陬，必呼老兵退卒，詢其曲折，與平日所聞不合，即發書檢勘，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，聚天下圖經，歷朝史籍，以及小說筆記，明十三朝實錄，公

(106.)

移邸報之類，有關於朝政民生者，酌古通今，旁推互證，不爲空談，期於致用。」

潘耒序炎武之知錄，亦曰：

「先生生長世族，少負絕異之資，潛心古學，九經諸史，略能背誦；尤留心當世之故，實錄奏報，手自鈔節，經世要務，一一講求。當明末年，奮欲有所自樹，而迄不得試，窮約以老。然憂天閭人之志，未嘗少衰，事關民生國命者，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。足跡半天下，所至交其賢豪長者，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，如指掌。」

而顧炎武亦自謂：

「一生所著之書，頗有足以啓後王，而垂來學者。」（亭林文集卷三，答曾庭聞書。）

至於黃宗羲，少年懷錐復父仇，壯而奔走救國難，其實事求是，已非常人所能及，故其爲學，亦必先窮經，而兼讀書史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謂：

「公謂：『明人講學，襲語錄之糟粕，不以六經爲根柢，束書而從事於遊談。』故受業者，必先窮經，經術所以經世，方不爲迂儒之學，故兼令讀書史。」

其著明夷待訪錄一書，顧炎武致書謂：

「讀之再三，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，百王之敝，可以復起；而三代之盛，可以徐還也。」

此皆或徵於實事，或徵於古籍，必期有以致用也。若夫顏元，出自寒微，備嘗艱苦，故其治學之方針，則更趨於實用，幾謂舍事物即無學問之可言者，如元所謂：

「必有事焉，學之要也。心有事則存，身有事則修，家之齊，國之治，皆有事也。無事則治與道俱廢，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，不見諸事，非德非用非生也；德行藝曰物，不徵諸物，非德非行非藝也。」（李恕谷著，習齋先生年譜卷上）

此直以爲學必須實踐，較之炎武宗義則更有進焉。然其道大毅，故自李燾之後，終於失傳，至於康熙雍正以降，文網漸密；學者徵實之方針，亦遂漸移而辨僞求真於典籍之中，以求避禍。閩若壇胡渭承顧黃之緒，首振其風，江永惠棟戴震段玉裁錢大昕洪亮吉王念孫等，相繼而起；或以復古爲目的，或以考覈得正解，而古昔聖賢之經籍，因而大明，魯魚亥豕之謬誤，得而矯正；雖不能致之於實踐之途，然其所學，考之於古而有徵，傳之後世可以信，此亦其「徵實」之功也。段玉裁曰：

「義理文章，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；自古聖人制作之大，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。得其情實，綜其終始，舉其綱以俟其目，與其利而防其弊；故能奠安萬世，雖有姦暴，不敢自外。中庸曰：君子之道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；考諸三王

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此非考覈之極致乎。」（戴東原集序）

觀段氏此言，則知當時考證之學，仍思有以致用也。但其「徵實」之方針，轉移於典籍之中，不敢直言時務，此與清初諸大師為異耳。故章太炎先生曰：

「諸學皆可以馴致躬行，近世為樸學者，其善三：明徵保定，遠于欺詐；先難後得，遠于微倖；習勞思善，遠于媮惰；故其學不應世，尙多個個寡尤之士。」（章氏叢書檢論卷四）

然清代學術，以考證為最盛，考證學家以昔人之言，載在方策；故必先明聲韻訓詁之道，於是博覽典籍，或闡發舊義，或辨別是非；故學術思想，亦偏重於實際。此風既盛，其他學者，亦漸受其影響而轉移。吾故曰：「徵實」之方針，清代學者，類皆有之也。

「勤勉」之精神，清代學者，尤為普及。蓋清儒治學，既以徵實為方針，而矯虛疏之弊；故或勤勉於事，或勤勉於學，思有以自立。勤勉於事者，思實踐也，勤勉於學者，求根據也。然因政治之影響，勤勉於學之精神，遂為清代學者之特徵。若顧炎武之精力絕人，無他嗜好，自少至老，未嘗一日廢書；出必載書數籠自隨，旅店少休，披尋搜討，曾無倦色；歷覽二十一史，十三朝實錄，天下圖經，前輩文編說部，以至公移邸報之類。黃宗羲年十九二十時，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，運明而起，雞鳴方已，二年而畢；於是明十三朝實錄，以及諸經九流百家，靡不究心。及隨魯王，失兵無援，猶與尚書吳鍾釐等，坐船中講學，推算歐羅巴歷法；而平生尤勤於著述，年逾八十，尚矻矻不休。顧黃勤勉之精神，有如是者，故鄧實所著亭林學說謂顧炎武「自經史以至國家典制，郡邑掌故；以至聲韻金石與地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，莫不窮源究委，條理燦然。」潘耒日知錄序謂顧炎武「九經諸史，略能背誦。」艾南英南雷詩歷序謂黃宗羲「博覽群書，兼通步算，能古文詞，尤工為詩。」浙江通志謂黃宗羲「上下古今，穿穴群言，自天官地志、九流百家之教，無不精研。」也。以是之故，炎武為清代經學之先導，宗羲為浙東史學之大師，其勤勉治學之功效，豈不偉哉。他若顏元李塉之勤於實事，閻若璩胡渭之承顧黃而勤於考證，皆為清初學者之特異精神，惜顏李之學，後無發揚光大之者，而閻胡之風，遂盛于乾嘉。乾嘉諸老，治考證之學，而辨偽求真，故莫不繼日夜之力，博而能賅，欲求有以超群拔萃。若江永戴震洪亮吉王念孫等，大抵著述等第；博覽旁通，而皆能悉心深究。試讀洪亮吉之言，亦可以知當治學勤勉之風，實足令人折服者。洪亮吉自述其治學之精神曰：

「鷄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，燭就拔則携素冊以到枕；衣上落虱，多而不嫌，凝塵浮冠，日以積寸；非門外入刺，巷側過車，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，所居介公卿之間也。」（卷施閣文乙集與孫季逵書）

觀上數語，乾嘉諸老「勤勉」之精神，可略見一斑。顧黃諸大師，倡之於前，乾嘉諸老，繼之於後，流風所被，而清代學

術，亦遂因此「勸勉」二字，大放其光芒矣。

三、清代學術之派別

學術思想，本難立派，趨舍不同，雖父子師弟之間，不可以強合也；然大別論之，亦可得而言，清代學術，以經學爲盛；浙東史學，亦能獨樹一幟。理學則竭而無餘華，雖其末流，猶有爭持於衰敗之餘，然志力薄弱，不足以張其軍。顏李之主實踐，權輿始基，而繼起乏人，唐甄劉獻廷雖遙遙相映，終於莫續，亦可惜也。茲分論之於下。

(一) 經學正統派 經學正統派，崑山顧炎武實爲其先導；炎武倡「舍經學無理學」之說，教人以博學爲先，於是學者漸知趨於舍華務實之途。著晉論，唐韻正，易本音，詩本音，古音表五書，古音始明；其後言聲韻訓詁者皆稟焉。太原閻若璩，撰古文尚書疏證，定東晉晚出古文尚書與孔傳僞作，學者宗之。德清胡渭，審察地望，系之禹貢，又撰易圖明辨，證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，皆出於道家之依託，而非義文周孔之舊，空說之根據以破。濟陽張爾岐，著儀禮鄭注句讀，吳氏儀禮考，古代禮儀始明。此皆一代碩儒，啓考證學之先聲，蓋正統派不祧之祖也。然草創未精博，時採雜元明調言。(本章太炎先生語)至於乾隆朝，其學始大昌盛；當時達官貴人，如大興朱筠、朱珪，鎮洋畢沅，儀徵阮元等，群相提倡。治學之道，亦漸著系統，於是吳派皖派，略有不同。

吳派始自惠棟，其學好博而尊經。棟吳縣人，先於棟時，有何焯、陳景雲、沈德潛，皆尚洽通，雜治經史文辭；至棟承其父士奇學，撰志經術，撰九經古義，周易述，明堂大道錄，古文尚書考，左傳補注，精妙不惑於雜說；然亦泛濫百家，嘗注後漢書，及王士禛詩，其餘筆語尤衆。弟子有江聲、余蕭客，亦吳縣人；聲爲尚書集注音疏，蕭客爲古經解詁，皆篤信於所聞，故綴次古義，鮮下己見。而嘉定王鳴盛錢大昕，卒被其風，益有所發舒。教於揚州，則江都汪中，實應劉台拱，高郵李惇賈田祖以次，相繼興起，長州褚寅亮，陽湖孫星衍洪亮吉，南城王聘珍等，亦彰斯學；蕭客弟子甘泉江藩，復續續周易述；此皆陳義爾雅，淵乎古訓是則者也。

皖派始自戴震，其學綜形名而任裁斷。震休寧人，受學於婺源江水；治小學，禮經，算術，輿地，皆能深通。其鄉里同學，有金榜程瑤田，後有凌廷堪胡匡衷胡培壺，皆善治禮，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。震又教於京師，興化任大椿，仁和盧文弨，曲阜孔廣森，皆從問業。弟子最知名者，金壇段玉裁，高郵王念孫。玉裁爲六書音韻表。以解說文，說文因之而明。念孫疏廣雅，以經傳諸子，轉相證明，諸古書文義詰詁者，皆得理解；授子引之，爲經傳釋詞，明古代辭氣，漢儒所不能理釋；其小學訓詁，自魏以來，未嘗有也。近世德清俞樾，瑞安孫詒讓，皆承念孫之學，有所發明。

。拋弟子餘杭草炳麟，尤能發揚光大其業，而集一代之大成。凡戴學諸家，其分析條理，皆多密嚴環，上溯古義，而斷以己之律令，（本章太炎先生語）此其異於惠學諸家也。

（二）經學別派 與閻若璩胡渭同時，有蕭山毛奇齡，休寧姚際恒等，亦勤考證之學，而有懷疑思想。姚際恒著古今偽書考等，疑詩序，疑周禮，疑古文尚書，閻若璩頗推崇之，惜其書多不顯著。毛奇齡撰河圖洛書原舛編，儀禮疑義等，疑河圖洛書儀禮之爲偽託，亦能自成一家之說；惟言古音則詆顧炎武，言尙書則詆閻若璩，每以意氣相尙，而時有自相矛盾者，故不爲清代學者所宗。復有秀水朱彝尊，無錫顧樞高，荆溪任啓運，皆先於惠棟戴震；彝尊著經義考；樞高著尙書質疑，春秋大事表，太儒粹語；啓運著經傳通纂，皆能勤於所學，然時援古義，樞鈍不能理解。（本章太炎先生語）其議論既不如專以漢學自名者之嚴謹，其方法又不如後來之精密，故亦爲正統派所攬。

（三）史學派 清代史學派，群推餘姚黃宗羲，爲其鉅子。然清初諸大師，多治史學，以求有以致用；崑山顧炎武，衡陽王夫之皆然，非獨宗羲一人而已也。炎武之史學，且高於宗羲，（本先叔父公鐸先生語）特同途而異軌耳。顧炎武以遭莊氏史案之獄，商榷至友，如潘耒章，吳炎等，皆屠戮無餘；其徒若潘耒輩，且畏禍隱匿其稿。（炎武若非徐乾學之舅，恐亦不免於死。）夫之終老空山，其書百餘年後始出，故傳者乏人。獨宗羲得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等，擴而行之，論者遂以史學一派，屬之浙東。然無錫顧祖禹，著讀史方輿紀要，體大思精，亦稍相近；而當時以史學名者，更有鄒瑛馬驥，仁和吳任臣等。瑛有釋史，任臣有十國春秋，均著博洽；稍後，大名崔述，陽湖趙翼，亦治史學；惟與黃萬浙東派不同耳。斯大斯同兄弟皆郵人，師事宗羲，稱說禮經，雜陳漢宋，而斯同獨尊史法，餘姚邵晉涵鄭縣全祖望繼之，尤善言明末遺事。會稽章學誠，爲文史校讐諸通義，以復故固之學；其卓約近史通，而說禮者羈縻不絕。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，始與皖派交通；其子以周，作禮書通故，三代制度大定。而近世平陽宋恕，瑞安陳黻宸，亦能發揚斯學。

（四）理學派 清初之學術，既無一不爲明學之反動；故言理學者，亦大抵排明季之學風，而期復歸於程朱。當時承姚江餘緒，而爲之收拾殘局者，尚有容城孫奇逢，盤屋李顥。與姚江書院派之餘姚沈國模，史孝威、管宗聖、韓孔當、邵曾可，山陰王朝式，及曾可之孫廷采等。奇逢重實用，李顥重踐履，教人切己反躬，注重日月；其學與明人已大不同，惟於陽明未張反對之幟，故奇逢門人唯州湯斌，登封耿介，上蔡張沐等，遂與程朱日趨接近，而祁州刁包，富平李因篤等，亦近此派。姚江書院派之沈國模，史孝威等，頗以紹述姚江自命，然局量狹小，識見亦淺；當時學者，且多病其近禪；故其學不昌，惟邵廷采一人，稍近明末劉宗周，較爲可取耳。至於桐鄉張履祥，太倉陸世儀，平湖陸隴其，安溪李光地等，則直以格遵程朱爲名。履祥深重踐履；至世儀則以格、致、正、誠、修、齊、治、平爲程序，以居敬窮理，省察克治爲工夫；而致用之思想亦盛。隴其攻王學不遺餘力，衛道之精神極熾，清代言程朱之學者，皆宗焉。光地論學以志、敬、知、

(110)

行爲序，而於歷數之學亦精；與奇逢弟子湯斌，及蔚州魏象樞，柏鄉魏裔介，孝威熊錫履諸人，皆身爲顯宦，而以「道統」爲觀念，提倡程朱者也。他若，南豐謝文沛，仁和應鴻謙等，皆專力程朱，而能篤於躬行。然當時經學之勢大盛，諸君子雖欲挽此衰敗，不可得已；故終不能恢宏光大。乾隆時，桐城姚鼐，慕戴震之風，欲從震學，震謝之，而以微言相匡飭；鼐不平，遂自標爲理學之宗，數持論詆漢學殘碎，其後方東樹爲漢學商兌，力排漢學；其排斥漢學之言，雖多卓識，然於理學僅爲標榜之工具，其志與力，實不足以振而起之也。

(五) 實踐派 清初博野顏元，起自微賤，故爲學力主實踐，對於宋明理學，皆加攻訐，而於程朱尤甚；謂程朱集漢晉釋老之大成，而非周孔之正傳。漢儒之訓詁，魏晉之玄談，釋老之虛無，與夫一切幻想冥思，徒耗精力，無益實際者，元皆斥之不遺餘力；生平以六藝教人，作存學編，存人編，存治編，存性編等書，慨然有救世之志，而其學之苦行精神，則有近於墨子。弟子最著者，有蠡縣李塨，大興王源；而塨尤能光大其學。故世以顏李並稱。惜以苦行太甚，後無傳者。惟當時大興劉獻廷，達州唐甄，與其遙遙相映，略有近似。

(六) 歷算派 歷算之學，我國表章在昔，自明季西學東漸，從者風靡，幾成喧賓奪主之勢；賴有識之士，起爲溝通之，於是其道益光；吳江王錫闡，宣城梅文鼎，蓋其先導也。錫闡文鼎，兼採中西，去其紕繆，文鼎之弟文鼐，文鼐子以燕，孫穀成，及弟子江夏劉湘煙，皆能發揚其業。而淄川薛鳳祚，桐城方中通，泰州陳厚耀，上元談泰等，亦皆以天算名，然其學視王梅則稍遜。他若黃宗羲，江永、戴震、錢大昕等，皆精此道，則出其餘力爲之，非專以此名家也。

(七) 今文學派 武進莊存與，與戴震同時，治公羊春秋，作春秋正辭；公羊春秋者，經今文學也。漢時，今文學家每排斥古文經傳爲僞託，而存與治公羊，雖爲今文，尙猶稱說古文周官。及其弟陽湖劉逢祿，乃專主董生李育之說，而爲公羊釋例，長洲宋翔鳳，邵陽魏源，亦被其風，益有所論述；逢祿疑春秋左氏傳，魏源疑詩毛氏傳，皆能自圓其說。仁和龔自珍，段珍裁之外孫也，亦好治公羊，與魏源相稱譽；而仁和邵懿辰，爲尙書通義，禮經通論；疑逸書十六篇，逸禮三十九篇，爲劉歆僞託，此皆有懷疑思想者也，近世康有爲綜集各家之說，嚴分古今之界；而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，皆劉歆所僞造。且宗公羊而立孔子改制之說，謂六經皆孔子所作，堯舜皆孔子所依託；抱致用之志，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。弟子新會梁啟超，亦能弘大其學，然自謂與正統因緣較深，時時不慊於其師之武斷，故末流多有異同。